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4)06-0053-08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的报刊实践和群体特征

刘人锋

(湖南女子学院 女性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陈颉芬、唐群英、张汉英和张昭汉, 创办、编辑了不少近代史上重要的报纸和刊物, 对近代革命、近代妇女解放和报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作为群体具有多方面的共同特征, 如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善于写作政论文、创办学校从事教育工作。这些女报人作为群体出现的原因在于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和妇女解放实践的推行; 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 她们均生于开明的家庭, 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关键词: 近代湖南; 女报人; 报刊实践; 群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56.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24027

引用格式: 刘人锋.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的报刊实践和群体特征[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6): 53-60.

Practi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Journalists from Modern Hunan

LIU Renfeng

(Center of Women's Study,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Modern Hunan's female journalists, including Chen Xiefen, Tang Qunying, Zhang Hanying and Zhang Zhaohan, played pivotal roles in founding and editing influential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Their contribution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modern revolution,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press's evolution. Common traits among these journalists include their involvement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leadership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xcellence in political writ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ir emergence was fueled by the rise of women's liberation ideas, practical efforts for empowerment, advancements in journalism, and supportive famili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modern Hunan; female journalists; newspaper practices;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陈颉芬、唐群英、张汉英和张昭汉四位湖南籍女性,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女报人, 她们通过创办、编辑报刊, 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活动, 对近代革命、近代妇女解放和报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她们作为报人在报刊实践、推动近代革命和妇女解放、为什么成为报人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对女报人群体的报刊活动和共同特征系统梳理和研究, 既能反映时代对女性人才群体形成的影响, 又能展示近代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既可以丰富近代革命史、女性史和报刊史

研究, 又能为当代女性人才的成长提供历史借鉴。

1 报人的报刊实践

陈颉芬(1883—1923), 祖籍湖南衡山, 生于江苏阳湖(今属常州)。1899年冬, 陈颉芬在上海创办《女报》半月刊, 提倡女学, 随父亲陈范主办的《苏报》附送, 《女报》出版4期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02年5月8日, 《女报》在上海复刊, 月刊, 封面报名前冠以“续出”二字, 仍然随《苏报》附送, 以提倡女子教育为主。1903年, 陈颉芬设《女学报》馆, 从

收稿日期: 2024-03-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 近代湖南女杰群体研究(XSP22YBZ029)

作者简介: 刘人锋(1972—), 女, 教授, 博士, 从事专业: 女性文学、女性历史。E-mail: 1328375438@qq.com。

《苏报》馆独立出来,《女报》从1903年3月13日第1期开始改名为《女学报》,刊登陈撷芬的文章《独立篇》,表明从《苏报》独立出来。

由于《苏报》大力宣传反清思想,1903年7月7日,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女学报》连带被迫停刊,当年已出至第3期。《苏报》被查封后陈撷芬随父前往日本,1903年11月《女学报》在东京恢复出版第4期,由章士钊在上海创办的《国民日报》发行,此期陈撷芬的文章署名改为“楚南女子”,主要是为了避免“苏报案”的影响,同时也表明她不忘自己的祖籍湖南。虽然陈撷芬表示还要继续办下去,但是目前暂无资料表明后来继续出版。续出的《女报》(《女学报》)大受欢迎,“远近索取者纷纷不已”,《女学报》因此刊出“兹特另行排印,每本售洋一角”^{[1]31}的广告。《神州女报》认为“放一线光明,为朝阳之鸣凤者,曰陈女士之《女学报》”^{[2]292}。丘逢甲赞扬陈撷芬办报“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3]135}。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唐群英一生创办编辑多种报刊,1911年5月,她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出版,以“提倡女学、尊重女权、改良婚姻、振兴职业”为主旨^{[4]805},初定为季刊,但是至今只见创刊号,不知何时终刊。根据唐群英《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群英亦于同时发起女学会于东京,编辑女学杂志,按季出版,欲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一期出版,颇受社会欢迎。二期稿甫脱,而武汉义旗高举矣,群英遂回国,奔走于长江流域,尽力革命事务。”^{[5]263}由此看来,唐群英只编辑了第1期,或许也只出版了第1期。宁调元读了《留日女学会杂志》创刊号,评价该刊“大旨在提倡职业,尊重人权,灌输德育。其《女权正说》《女子复权论》诸篇,尤为全书精神所在。谊正而词明。前此诸女界杂志,得未曾有,足为全国二万万女同胞下一当头棒喝矣”^{[6]193}。《民立报》认为该刊“议论宏卓,文章修雅,诚为女学界不可不读之良编也”^{[4]805}。

在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过程中,唐群英深感报刊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唤起妇女要求平等意识中的重要作用,1912年10月21日与张昭汉、张汉英和陈撷芬等在北京发起创办《女子白话报》,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传阵地。《女子白话报》因每旬出版,初名《女子白话旬报》,从第8期开始改为半月刊,更名为《女子白话报》。《女子白话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

求达到男女平权目的为宗旨”^{[5]264}。原因在于“当兹女学未发达之日,女权未伸张之时,示以高文则难达,演为白话或易懂”^{[5]263}。该报紧紧围绕女子参政,语言通俗易懂,“向女界灌输新思想、新观念,是一份进步的妇女刊物”^{[7]104}。由于袁世凯为了恢复封建帝制禁止妇女参政,1913年5月《女子白话报》出版了第11期后被迫停刊。

1912年11月16日,唐群英与仇鳌在北京创办《亚东丛报》月刊,附设于《女子白话报》社内,“以提倡女权,发挥民生主义,促进个人自治为宗旨”^{[5]265}。《亚东丛报》由宋教仁和仇鳌创办的《亚东新报》日报改版而来,与《女子白话报》一样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传阵地。由于袁世凯对革命的打压,1913年11月《亚东丛报》被迫停刊。

1912年12月,唐群英回到长沙,当时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的丁佩兰及其丈夫丁云龙打算创办《女权日报》,因缺乏经费未办成。不久,张汉英到长沙,打算用她筹集的一笔经费开办女子法政学校,唐群英与张汉英商议先用这笔经费创办《女权日报》,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的会报,日后再办学校,得到张汉英的同意。1913年2月16日,《女权日报》创刊,日出两大张,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权日报》宣传男女平权、共参国政,号召女性反对封建统治,走向社会,争取女权,一时之间湖南妇女界焕发勃勃生机。湖南省议会决议“按照乙等津贴,月给六百元作为经费”^{[6]328},但是由于袁世凯政府禁止妇女解放运动,解散女子团体,同年底《女权日报》“于此次湘省独立事附和国民党论调又变,近以经济困难,而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国民会俱奉令解散,势孤力薄,遂于前日宣布停版”^{[6]328}。

张汉英(1872—1915),湖南醴陵人。张汉英除了与唐群英等创办《女子白话报》《女权日报》,还于1913年4月与陈德晖在上海创办《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该报是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分部的机关报,以“增进女子常识,阐明天赋人权,为将来女子参政之预备”^{[8]21}。该报有三条政纲:“主张政府之权力,为有限制的,以充实吾女子爱国心,而与男子分担此巩固共和之天职。”“主张国会用监督主义,以矫正其行为,促其进行,而为厥后盾。”^{[2]556}“持不党主义,以精锐之眼光,观察各党,其政见之良者,自予以充分之赞成,其不良者,必为极端之反对。”^{[2]557}旬报第3期刊登广告表示自6月起扩充篇幅,改为月刊,定名《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作为

第 4 期继续出版,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因此旬报只出版了 3 期。

张昭汉(1884—1965),湖南湘乡人。1911 年 11 月,张昭汉在苏州创办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江苏大汉报》,聘请陈去病、傅熊湘、金松岑为主笔,张昭汉本人撰写社论或时评,日出一大张,及时报道革命消息,密切配合革命活动,可惜不久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1912 年 11 月,张昭汉发起成立的神州女界协济社创办《神州女报》,原因在于“今本社同人,既殚精竭虑于教育、实业之预备,故鼓吹平权之道,及参政之理,崇实黜华,唯德是蹈。应而和者,遍于南北。又将以研究所得之一知半解,就正于海内贤人君子,因是报而发表之”^{[2]296},同时“男女皆有以扩政治之思想,急国家之义务”^{[2]297},因此创办《神州女报》。

《神州女报》初为旬刊,1913 年 2 月出版了第 8 期后改为月刊,又出版 4 期后于 1913 年 7 月停刊。《神州女报》的内容主要是普及教育、提倡实业,反映女子争取参政权的情况,主张妇女获得参政权,探讨妇女如何获得参政权。时人称赞《神州女报》“发现于东亚大陆,开女报界之先河”^{[9]230}。除了创办报刊,1927 年张昭汉还主持《神州日报》,主编《上海日报》每周妇女专刊。

女报人通过创办报刊宣传社会变革,提倡妇女解放,推动了时代发展。她们创办的报刊是近代报刊史和妇女史上的重要出版物,是今天近代报刊和妇女研究的重要资料。

2 女报人的共同特征

综观女报人的人生经历,她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2.1 从事革命活动

避居日本期间,陈撷芬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如加入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与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1904 年 10 月,陈撷芬与秋瑾等留日女学生一起改组妇女团体共爱会为“实行共爱会”,被推选为会长。改组后的共爱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10]298}为宗旨。同盟会成立后不久陈撷芬即入会,与秋瑾、唐群英等加入在横滨创设的炸弹制造所,准备武装起义。

在日本唐群英广泛结交革命志士,1905 年 5 月加入黄兴领导的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 年 8 月 20 日同盟会成立,唐群英即加入该会。唐群英积极领导留日女学生的革命活动,如 1906 年 9 月 23 日,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会在东京成立,唐群英被选为书记;1910 年 6 月,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东渡日本,以学习音乐专科为名,组织领导留日女学生的革命活动,于 1911 年 3 月发起成立留日女学会,创办会刊,开展革命活动。

在国内唐群英常和张汉英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如 1907 年底,她们联络陈荆在长沙、湘乡和衡山等地开展武装起义。1911 年 12 月,唐群英和张汉英在上海成立“北伐军救济队”,聘请医生护士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成立“女子后援会”,筹集革命资金。与此同时,张昭汉任干事长的筹饷组织“上海女界协赞会”成立,由于工作目标一致,张昭汉作为“女子后援会”的发起人,唐群英担任“上海女界协赞会”的干事。唐群英除了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还积极投身反袁护国运动,为建立民主国家而奋斗。

1906 年 6 月 17 日,张昭汉加入同盟会,随后与秋瑾等在江浙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保路运动兴起时,张昭汉在浙江参加反对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筑沪杭铁路的活动。1909 年,清政府搜捕革命党人,张昭汉积极掩护参加革命的亲属。在辛亥革命中,张昭汉和父亲张通典赴苏州力劝巡抚程德全起义,成功说服他脱离清政府统治宣布独立,同时张昭汉协助其撰写有关文件和材料,受其委托创办《江苏大汉报》。

除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张昭汉还积极参加反对外国侵略的活动。1912 年 11 月,她领导的神州女界协济社参加反对《俄蒙协约》活动,抗议沙俄勾结蒙古国叛国势力独立。巴黎和会期间,张昭汉在美国组织爱国会力争国权,作为代表赴巴黎阻止中国代表出席签字会议。

女报人都有一个身份,即同盟会会员。唐群英在同盟会成立时即为会员,陈撷芬、张汉英在同盟会成立后即入会,张昭汉第二年入会,可见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对她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深刻影响。

2.2 领导妇女参政运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妇女解放朝着要求参与政权的方向发展,近代湖南籍女报人是妇女参政运动的骨干力量。1912 年 1 月 28 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即将制定《临时约法》,唐群英、张汉英和张昭汉等积极建言献策,2 月 27 日联名发出《中华民

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请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11]298}但是，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下，只称“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3月18日，唐群英、张汉英和张昭汉等联名上书《女子参政会上孙中山书》，指出《临时约法》“不独不为积极的规定，反为消极的取消”，建议“或请删去‘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语，以为将来解释上捐除障碍；或即请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公允”^{[11]299-300}。

虽然女报人多次要求将女子参政权写入临时约法，但是由于临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这个要求没有如愿，不过她们没有放弃继续奋斗。1912年4月8日，在唐群英、张汉英等的联络下，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2]586}，张汉英为总务部负责人，唐群英为政事部负责人。

为争取袁世凯政府承认女子参政权，1912年5月，唐群英与同为湖南籍的王昌国到北京开展女子参政运动，张汉英留守南京继续开展要求参政的活动。袁世凯为了称帝极力压制女子参政运动，唐群英意识到女子要想获得参政权必须要有牢固广泛的社会基础，决定先从地方发动妇女群众，培养她们的参政意识，然后争取女子参政权。1912年12月中旬，唐群英回到长沙，在她的积极组织 and 推动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成立。不久，张汉英也回到长沙加入湖南支部的工作。

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勒令解散，妇女参政运动落入低潮。虽然唐群英在家乡办学，但是她一直关注女子参政运动，当王昌国邀请她到长沙共商恢复湖南女界联合会事宜时，她欣然前往。1924年6月9日，湖南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该会有力促进了湖南的女子参政运动。

张昭汉除了与唐群英和张汉英一起领导民初女子参政运动，1912年3月1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协济社，“以联合五族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养成共和国高尚完全女国民，协助国家进步为宗旨”^{[6]296}。张昭汉任社长，推举唐群英、张汉英负责编辑部、法政部事务，陈撷芬也是该社发起人之一。

1912年8月31日，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

人率队到达上海，张昭汉、陈撷芬、杨季威和陈鸿璧等与嘉德夫人一行交流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情况。嘉德夫人到北京后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会面，勉励中国女界组成一个大团体，加入万国女子参政会。

女报人都是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和领导者，虽然最后由于军阀政府压制妇女参政并未实现，但是她们领导的参政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第一次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反映了近代妇女追求平等权利的自主性，启发了后来妇女对参政权的争取。

2.3 善于写作政论文

报刊的创办需要文章，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也需要文章，“就其舆论导向的直接性、明确性、快速性而论，政论文是女性报刊的最佳文体选择。于是女性报刊中便出现了社说、时评、论说、演说、谈丛等栏目，这些栏目的文章大多属于政论文体”^{[12]1771}。当时，女性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是能够接受学校教育的女性有限，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能够写作政论文的不多，因此女报人往往既是创办者或主编，又是主笔，经常撰写政论文章。

陈撷芬的政论文如《快些做事》《独立篇》《论女子宜讲体育》《尽力》《中国女子之前途》《女界之可危》等，号召兴办女学，鼓励妇女独立，“与其使彼受明达男子之教，毋宁得明达女子自教之矣”^{[2]245}，主张妇女投身革命，“能言者则鼓吹之，能文者则扬厉之，能行者则实行之”^{[2]226}，因为“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2]230}。

唐群英的很多文章是为争取女子参政权而写，如《女子后援会意见书》《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女子参政会上孙中山书》《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等，逻辑严密，有理有据。例如：“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1]297}“民国新立，正宜破除前日之积习，伸张固有之民权。然有绝对的可以认许在宪法上永久不移易者，则如人民之参政权是；有不必为特别之限制以待其将来程度发达齐一而亦可认许之者，则如现在我国女子参政权是。”^{[11]306}唐群英执笔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

请愿书》逐条批驳临时约法的自相矛盾之处,论证严谨,气势如虹。

虽然张汉英留下的文章不多,但是仅从不多的文章也可见出她不凡的文采。她在《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的宣言中表达该报的办报主张:“必以最高尚之理想,达最英锐之论调,以最翔实之述录,造最正确之言论,而于中外纪事,尤所注意,原本方策,悉为有统系之编纂。”^{[2]556}言辞清晰,态度坚决,针对读者质疑女子参政的动机,张汉英表示:“吾人要求政权,非以之为角逐名场之资,实赖以吾人尽职之盾。”^{[2]542}“吾侪之要求参政,非仅私权之关系已也,上而国家,外而社会,内而家庭,胥以之为要素。”^{[2]543}要求女子参政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尽女子的社会责任,而且女子参政对家庭和女子本人都有利无弊,如“有参政权而家庭之专制祛,闺门之反唇无由起,有参政权而独立之生活讲,女子之人格日以崇,正本清源之方,久安长治之要,端在于是”^{[2]544}。

张昭汉自晚清就开始在报刊发表政论文,阐述她的见解,认为班昭的“《女诫》乃以卑弱下人为宗旨,养成柔弱根性为目的,是使群女子相率而为自暴自弃也”^{[2]273}。“若女子皆尚卑弱,自暴自弃,则已废其国民之半部分,而男子亦并受其累矣。且培植人才,基于幼稚,今既无良妻贤母,以施家庭教育,民族懦弱不问可知,此其国能自存于世界乎?”^{[2]273-274}她阐述女子应有参政权:“吾女界志士,固多与诸先烈奔走呼号,赴汤火冒斧钺而弗辞;洎运动成熟,义旗既举,则吾侪尽其心力,或托钵募饷,或束发从戎,或振笔锋,洒墨泪,发挥共和主义,鼓励军人敌忾之气。”^{[2]295}总之,革命的成功、民国的成立,女子有功,理所当然应有参政权。

女报人的政论文虽然多为文言体,但是没有佶屈聱牙之句,用语通俗,骈散相间,容易被读者理解。女报人写作政论文既为报刊提供稿件,有利于报刊的创办,又能宣传革命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想,有利于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还通过创作促进政论文文体走向成熟。

2.4 创办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在创办、编辑报刊,从事革命工作,推动妇女解放的同时,女报人还创办学校从事教育工作。1903年,陈撷芬在女学报馆内办有自立女学塾会,后来随丈夫杨希仲在重庆“共同倡办依仁学校,广收杨氏子弟、姻娅后生及邻里童稚入学。陈撷芬任

校长,并亲自授外语。不数年该校即成为重庆著名学校之一”^{[14]454}。

据唐存正考证,唐群英先后办了十所学校^{[11]328-330}:1912年9月,在北京创办中央女学校;1913年5月,在长沙创办长沙女子法政学校;1913年7月,在长沙创办长沙自强女子职业学校;1913年7月,在长沙创办长沙女子美术学校;1919年春,唐群英在衡山白果镇创办红茶亭女校,任校长;1922年7月,在长沙创办湖南女子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初,在衡山县城筹办高级小学希陶女校,得到县政府的支持,改为公立,定名“衡山女子高级小学”,任校长;1924年3月,在长沙创办“复陶女子中学”,在该校附设法律专修科,任校长;1925年春,在“红茶亭女校”原址创办“岳北女子实业学校”,任校长;1930年秋,在家乡开办家塾式的“云在庐”课堂,她负责全部事务,还教数学和常识课程。

女子参政运动受挫,张汉英、唐群英决定先从女子教育着手,唐群英回衡山,张汉英回醴陵从事女子教育。1914年,张汉英创办醴陵女子学堂,任校长兼教员。张汉英参与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集资兴办了长沙女子法政学校、长沙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等。唐群英和张汉英还促成湖南省选派了官费留日女学生,她们都被选拔到现场监考。

张昭汉从事教育工作的历史较长。1907年,她应端方邀请任江苏省立粹敏女学教务长,在任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学校办成名校;1912年秋,神州女界协济社创办神州女学,张昭汉任校长,该校分初等小学班和高等小学版,还设专修科,招收程度较高、年龄较长者。此外,张昭汉还学习外国的教育方式方法。1918年,她赴欧美考察教育,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1919年夏,她游历英法德比瑞士等国,考察社会情况和妇女教育问题,著《欧美教育考察录》。

1920年冬,张昭汉回到上海,继续担任神州女学校校长,不久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学校附近设立夜校,开设教学点,教失学的妇女儿童。1921年,张昭汉任中国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组长及校际主任,参与发起平民教育运动,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1925年,她与丈夫邵元冲及诸同人设立中山学院。1927年,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杭州市教育局局长。

女报人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是她们从事报刊活动的延续。创办报刊是为了传播思想,启发民智,推动社会发展,创办学校的目的和所起到的作用亦如此,所以当受到各种限制报刊不能继续出版的时候,女报人不约而同地办学以教书育人了。

3 女报人群体出现的原因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群体的出现既有时代原因,也有家庭和自身的原因。

3.1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和妇女解放实践的推行

19世纪中后期,西方殖民者在对中国实行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同时,客观上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传教士对废缠足和兴女学的宣传,对欧美女性在婚姻、教育、职业及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的介绍,对传统中国的女性观念产生很大冲击。早期维新派郑观应、陈炽和宋恕等提出禁溺女、废缠足,倡导女子接受教育等观点,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在要求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变革的同时,强调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把妇女解放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

到了20世纪,马君武翻译了多部反映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著作,为当时的妇女解放提供理论根据。例如,1902年11月,马君武翻译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女权篇》出版,运用自然权利学说和进化论观点阐明男女平等思想。1903年2月,马君武翻译英国哲学家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出版,既是人人平等观念的理论资源,也是妇女解放的思想基础。1903年4月,马君武翻译的《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在《新民丛报》发表,介绍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德国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力主男女权利平等且阐述其合理性。

马君武翻译介绍西方女权思想对时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借鉴女权理论著书立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天翻和他的《女界钟》。《女界钟》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毒害,批判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制,驳斥男尊女卑的荒谬,论证男女平等的合理性,提出女子应该在人身、教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女界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将西方女权理论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系统提出妇女解放的著作,对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妇女解放思想发展的同时,妇女解放实践也在推行。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在中国成立反对缠足的团体,创办女子学校,并且在他们创办的中文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始从脚到头解放中国女性。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成立了许多反缠足团体,创办了女学堂。到20世纪初,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权;批判传统贤妻良母,争做女国民,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

四位女报人均出生成长在妇女解放思想不断发展和妇女解放实践逐渐推行的时代,受到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她们树立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为了批判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改变男强女弱的陈腐观念,宣传男女平等,推动妇女解放,需要传播媒介来担此重任,在当时创办报刊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3.2 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已近半个世纪,近代报刊的作用以及创办报刊的基本模式和要求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19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在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出现。同时,清朝腐败的统治,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危难的时局使维新变法思潮达到高峰。维新派深刻认识到报刊在传播思想、改变观念和改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把创办报刊作为推动变法运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在全国各地创办许多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践中认识到报刊在宣传政治主张、发动民众中的重要作用,在推翻清王朝、试图建立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报刊。同时,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对它的不满,为了苟延残喘,于1901年宣布“新政”,有限开放报禁、言禁,允许人们创办报刊,客观上促进了报刊的繁荣。革命派创办的报刊是20世纪初期办报高潮中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许多宣传反清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报刊。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多在20世纪初期,这时中国人自办报刊已有20多年,在如何创办及运营报刊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当她们需要表达、传播革命主张和妇女解放的意愿时,很自然地通过报刊来实现。而且,针对女性创办和编辑报刊,维

新时期的《女学报》已经作了示范,社会已经接受女性同样可以成为报人,因此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是近代湖南女报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3.3 良好的家庭环境

这不仅指经济条件,还包括家庭成员思想开明和本身的学养,不仅在经济上能够使女报人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能多方面对女报人施以良好的影响。

陈撷芬深受父亲陈范的影响。陈范做江西铅山知县时,因为处理教案引起朝廷不满,打击地方势力也遭受诬告,1895年被革职,这加深了他对清朝官场腐败的痛恨。因“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15]122},1900年陈范出资承办胡铁梅创办的《苏报》,宣传改良和保皇。随着反清革命思潮日益高涨,陈范的思想逐渐由改良与保皇转向支持反清革命。1903年初,陈范聘请蔡元培、吴稚晖和章炳麟等担任《苏报》撰稿人;同年5月,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大力宣传反清革命。

父亲的革命思想深深影响了陈撷芬,加上“《苏报》案”后她随父避居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留日革命志士,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民主革命思想,促使她参加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父亲承办《苏报》使陈撷芬有机会常常在《苏报》上发表诗文,锻炼了她的文笔,也为她创办《女报》提供了便利条件。陈撷芬的家庭环境使她能够就读上海中西女塾、爱国女校,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这是她能办报的基本条件。

唐群英出身宦宦之家,父亲唐星照在咸丰初年入湘军,因功升提督,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简放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星照对唐群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唐星照办家塾让唐群英读书。1867年,唐星照获准退出官场,回到家乡广置田产,专门修建书屋“是吾家”,在书屋设置唐氏家塾,聘请塾师,让包括唐群英在内的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及近亲子侄一起读书。其次,唐星照退居家乡之后不仅自己依然骑马舞剑,还教唐群英,这不仅练就唐群英的英武之气,而且有助于培养唐群英的男女平等意识。最后,唐星照乐善好施,经常接济穷苦乡亲,带头捐资架桥修路,定期开仓赈济贫民。这种不吝资财为百姓服务的行为对唐群英日后不惜私产兴办学校有着深刻影响。

唐群英的弟弟唐乾一也是促使她成为杰出女性的重要人物。唐群英不幸先后失去女儿和丈夫,

在婆家要求她守节的时候,唐乾一积极操持唐群英回娘家的事情,母亲曹氏、哥哥唐维藩、姐姐唐希孟、唐希范都支持她回到娘家,不仅避免唐群英成为节妇的悲惨命运,而且是她日后投身革命的重要起点。当唐群英想留学日本的时候,唐乾一反复做母亲的工作,使母亲同意唐群英留日。在唐群英留学日本前,母亲将田产230多亩分为三份,两个儿子和唐群英各一份,给予她经济支持,唐维藩、唐乾一都赞成这种分配方式。唐乾一还为姐姐安排留日的具体出行方式,给姐姐莫大的支持。从唐群英的家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开明的家庭,他们支持出嫁的唐群英永远回到娘家,像儿子一样分给财产,支持她留日,这些超出时代许多人的做法无疑对唐群英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使她敢为人先,成为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

张汉英的父亲张云齐学通经史,好诗词,善书法。张云齐思想开明,不仅在张汉英年幼的时候就教她读书识字,而且在女子教育兴起后,还送张汉英到长沙女子中学堂学习。留学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令各省选派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习,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令各县选派女学生留日,由于张汉英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因而获选。1904年夏,张汉英赴日本东京实践女校学习,在这里她结识了秋瑾、唐群英等,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可以说,父亲的开明帮她打下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为她成为女报人、领导妇女运动创造了条件。

张昭汉的父亲张通典一生倡导民主,忧国忧民。光绪年间,他协助曾国荃办两江学务,戊戌年间与谭嗣同、黄遵宪、陈三立和梁启超等在长沙倡南学会,办时务学堂、《时务报》和《湘报》等。1901年,张通典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托,先后创办养正学堂、养正女学、湖南旅宁公学等学校,其中养正女学由张昭汉的母亲何承徽担任校长,张昭汉在此求学并为附属小学义务教授文史伦理等课程。1905年12月,张通典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内务司司长,还是南社社员。父亲的思想倾向、忧时伤世的情怀及实际行动深深影响了张昭汉。

张昭汉的家庭条件使她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善诗文,著有《天放楼文集》《袖海棠文集》《框言》《志学斋笔记》。母亲也善诗词歌赋,有《仪孝堂诗集》2卷。张昭汉受父母熏陶,启蒙极早,3岁读《诗经》,4岁读《唐诗》且学作对联,6岁进私塾,除了在养正女学学习又入汇文女学学习英文。

1904年,张昭汉考入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毕业随父移居苏州,入景海女校学习英文,1911年入上海圣约翰女子书院学习。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群体的出现及她们具有的特征,离不开湖南的社会风气对她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湖南虽为内陆省份,但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既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东南和西南往来的枢纽,尤其清初湖南单独设省之后,地理位置更显重要,更加促进湖南社会的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湖南由于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区”^{[16]54},这种交锋有助于除旧更新,进一步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思想的开放。19世纪末期,任职湖南的重要官员如学政江标、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均主张维新变法,在湖南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支持创立时务学堂、南学会,支持创办《湘学报》《湘报》,使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在此社会环境中,唐群英、张昭汉和张汉英的父亲均受到维新变法、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从而都重视对女儿的培养,让她们接受与男子一样的教育。即使当时已在江苏的陈范,也是以“湘人”^{[17]9}自居,可见他认同湖南,仍然把湖南作为自己的家乡。受父亲的影响,当陈撷芬避居日本,不使用本名撰文的时候,自然署名“楚南女史”。至于唐群英、张昭汉和张汉英,不仅通过父亲间接受益于湖南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而且她们出生成长在湖南,直接受到本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优势,出身书香门第,来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家庭,不仅能够接受较好的家庭教育,还能接受新式学堂教育,还善于接受新思想新媒介,投身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创办报刊和学校来实践自己的主张。

4 结 语

近代湖南籍女报人群体在晚清民初社会巨变的时期,通过或创办或编辑报刊传播革命思想和妇

女解放观念,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妇女的解放,同时她们在艰苦的办报环境中创编一份又一份报刊,推动了近代报刊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她们作为报人、成为报人的群体特征既是历史的经验,也对今天女性在传媒领域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夏晓虹. 晚清两份《女学报》的前世今生[J]. 现代中文学期刊, 2012(1): 25-33.
-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3] 丘逢甲, 著. 冯海荣, 选注. 丘逢甲诗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4] 李又宁, 张玉法. 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1842—1911[M]. 台北: 龙文出版社, 1995.
- [5] 蒋薛, 唐存正. 唐群英评传[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 [6] 张莲波.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社团[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7] 姜纬堂, 刘宁元. 北京妇女报刊考: 1905—1949[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 [8] 田景昆, 郑晓燕. 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通览[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0.
- [9] 王国宇. 湖南女杰传略[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刘宁元, 主编. 姜纬堂, 编著. 中国女性史类编[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1] 刘静, 唐存正. 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12]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3] 郑逸梅. 艺林散叶[M]. 新1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4] 寿充一.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一册)[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 [15]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6] 陶用舒. 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17] 周宇清. 陈范与辛亥革命[D]. 扬州: 扬州大学, 2007.